

15.15

陽春文史

第廿一輯



阳 谷 文 史

1991年第1辑 (总第21辑)

阳谷县政协文史科编印

1991年9月

目 录

抗日战争以前的范筑先将军.....	周云章 1
青幼年时代 (1881——1904)	1
马厂练兵 (1904——1913)	3
调防上海 (1913——1929)	7
投西北军 (1929——1931)	14
山东赈灾 (1931——1932)	16
初任沂水 (1932——1933)	17
调任临沂 (1933——1936)	24
督察六区 (1936——1937)	40
附注	47

编校：李印元 郑清明

抗日战争以前的范筑先将军

周云章

青幼年时代（1881——1904）

范筑先将军系山东馆陶县（现改属河北省）南彦寺村人，生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十一月廿一日，他父亲叫范廷云，母亲胡氏，他的原名叫范金标，字夺魁，有一个弟弟叫范金润。于1906年和本县常儿寨武氏结婚，范筑先将军希望她成为治国之才，给她起了个名子叫武治国，1938年抗日初期在鲁西北根据地担任妇女救国会主任。她生了6个孩子，2男4女（注1）。

范筑先将军幼年时家甚贫，仅有坟地2亩半，没有房子，借住本村武家一间房子以安身。他父亲当经纪，有时给地主当短工，母亲纺花织布，以维持生活。当他9岁时，他父亲送他在本村义学（注2）读书，由于家很穷，上学不容易，在他父亲的教育下非常用功，每到秋夏散学时，在拾柴割草空隙时间，他总是手不释卷，背诵在学校学习的功课，所以成绩比较突出，在学校没有受过责罚，没有挨过“戒尺”。义学老师叫张老炳，特别喜爱他，同学们也非常尊重他。为鼓励他进步，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号叫“夺魁”，意思是希望他在考场中夺众人之首。

他在义学读了四年书，念了《百家姓》、《三字经》、一部

《论语》、半部《孟子》，当他13岁的时候，他父亲因饥饿贫困得了病，请不起医生，吃不起药，硬硬的靠死了，只剩下寡母一人抚养3个儿子艰苦度日。他是长子，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母亲干活，除耕种那2亩半荒地（实耕地不到2亩）外，只有靠寡母纺花织布以糊口。范金标虽小，但非常勤苦，天不明即起，夏季割草，冬季拾粪，卖给地主，以补助生活。他15岁时，给本村武天祥拉小车去河南贩卖粮食，来回七八天，可得雇金1串钱。18岁成年后，又给别人推小车来往于朝城、临清之间，每趟可赚3吊钱。到20岁以后，他比别人更能吃苦，别人推3斗，他推1石2。

他很孝顺，在父母跟前很服手，父母叫干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闹过别扭，讨过价钱，尤其他父亲死后，他在寡母跟前奉养备至，只要看母亲有一点不高兴，他总是想一切办法来安慰她，好的东西叫母亲吃，他吃的糟糠。有一次从临清推小车回来，路过柴堡集（距南彦寺12里）打尖，别人都吃得饱饱的，他买了1斤馒头放在车上没有舍得吃，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我省了这顿饭给俺娘买1斤馒头，她在家可能还饿着呢！”他熬了熬腰挨着饿一直推回家。他每次推车外出，总是推的粮食多化的盘费少，结余点钱给母亲捎点吃的，附近各村都知道南彦寺后街有个孝子。

清末时代，政治上的腐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激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在山东馆陶堂邑一

带宋景诗曾发动了农民起义，在邱馆边界有小白旗造反（小白旗是一种迷信会门，杀富济贫，把南彦寺地主张殿臣的粮食打开分给了农民），这些都给范筑先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他的年纪虽小，报国之志是很大的。

1904年是一个大灾年，赤地千里，将粒未收。南彦寺村的人，饿死的饿死，逃走的逃走，推小车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了。眼看全家人都要饿死，适逢威县一位姓尚的给北洋军招兵，他奉母命到了天津马厂投军从戎。他临走的时候，母亲把他叫到跟前说：“金标，你去当兵一定要好好地干，不要怕吃苦，不要贪便宜爱小钱。人家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当了兵可不要染上一身坏习气，成了兵油子，辜负我对你的培养。千万不要忘记咱们是穷人，人穷志不穷，要给穷人争一口气。过去我常给你讲的宋朝岳飞的故事，‘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母亲对你的嘱咐。”他跪在娘跟前说：“我一定听娘的话终身不忘。”就这样辞别了母亲，往马厂投军去了。

（以上材料是南彦寺农民、78岁老人范村丰口述）

马厂练兵（1904——1913）

到了马厂，分配到陆军第四镇炮兵第四标第三营右队第一棚当了备补兵，备补兵的任务是打扫院子、厕所、室内外卫生等零星事务，待遇每月3两3钱。他每天总比别人早起半小时，把工作完成之后，随队

出操。当了几个月的新兵，把腿都练肿了，但始终不懈（和他一同当兵的几个同乡因吃不了苦都跑回家了）。约半年的时间，上级看他勤学苦练，才提拔他为正式副兵，当了副兵之后，并未减轻自己的任务，各补兵的工作仍自觉的去完成。

他从小就养成好学习的习惯，入伍之后更努力，他白天不睡午觉，写大字，练习书法，晚间待熄灯号后，他把墙内挖一小洞以遮光，并用黑布罩起来点着蜡烛，阅读军事书籍和操典等，一直到半夜，长期坚持不断。除自己学习外，还帮助别人学习。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他们全棚建立了一个学习制度，点名以前每个兵学习两个生字。他这样提倡学习，他们的正目很高兴，因为大家把精力都用在在学习上，调皮的就少了，不几个月的工夫，全棚士兵都认识了不少生字，有的可以写简单的信了。以后又建立写大字制度，他带头学习，自任教员，全棚对他很尊重，他们每3个月考试一次，他总是名列第一，他们全棚总是得到集体荣誉。

营管带田友发发现了范金标这个新兵吃苦耐劳，学习刻苦，即把他调到本镇随营学校学习（2年毕业）。在随营学校里，他的学习和工作更突出，多次受到表扬，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所以他只学了1年半，即被提前挑选出来回本营本棚当了正目（即班长）。他当了正目以后，领导全棚不仅学习好，其他工作也比较突出。他把全棚分成三个学习组，第一组每天识字四、五个，第二组2至4个，第三

组比较笨，每天识字两个。他自己以身作则，坚持不懈地学习。不到半年时间，第一组即可以写信了，其他组也消减了文盲。除学习外，全棚提倡节约，每月每人储蓄2至5元，寄回家去。他领导的这个棚没有闹事生非的，没有违犯纪律的。因为他领导的有方，中队长叫他兼任全队的教习。1905年北洋陆军派人到各镇检阅，该中队考核取得了第一名，这与他领导教学是分不开的。当年他即被提升为本营右队司务长。

他当司务长时，全连伙食改善得特别好，每月公布帐目，财政公开。因为他学习好，有文化，全队的教学仍由他兼任。他的工作抓得很紧，学习也抓得很紧，每晚十一二点还不休息，盘仿改字，定分评语，有未完成学习任务的，他总是善言相劝，一丝不苟。每天他总比别人起得早，很认真地检查内务，并经常代理队长检查棚子，出早操，不辞劳苦，关心士兵。因此，他上下关系都很融洽，在全队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很尊重他。

当了司务长以后，他的收入富裕了，不忍母亲在家受苦，于1907年把母亲接到马厂。他每星期六回家，铺床叠被，嘘寒问暖，侍奉母亲无微不至。他的孝名很快传遍了全队，为大家所敬仰。

北洋军阀为培养下级骨干，在天津韩柳村开办了一所陆军讲武堂，2年毕业。范司务长被选派去该学堂学习。1908年毕业，即提升为本队第一排长，全标连以上学术两科的教习仍由他

担任。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欺骗他们，说调到河南去打秋操。他们第四镇开至河南南部，才发觉不是打秋操，而是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闹的士兵们糊里糊涂。打了第一仗后，才从敌方了解到，这是辛亥革命军反满清统治。范排长富于民族思想，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久怀不满，推翻满清和建立民国正是他的宿愿。现在打革命军，他思想上很不愉快，幸而只打了这一仗，第四师又回原防。经过这一次战斗，士兵们受到革命军的战场宣传，回到马厂后，大有暴动之势。上级发现了这种情绪，乃采取了紧急措施：凡是参加武汉战役的士兵和部分军官，遣散回家，每人发给3个月的饷金。范排长也在被遣散之列。由于他平时工作好，田管带把他留下了，在营里闲住了一段就升为第七连长（第四师回马厂后，镇改为师，协改为旅，标改为团，管带改为营，队改为连）。

这一个连是第四团留下的约百余人编成的，这百余人很难带，他们认为自己有功劳，为上级所信任，老大骄傲，自由散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范任连长后，首先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然后对症下药，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育，以个别谈话和集体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将大家说服了，士兵们做到了按时上课 上操，出入请假。他每天点名3次，好的表扬，违犯纪律的当场批评。凡外出不请假的，叫到自己屋内，让他端端正正地立正站着，一讲道理就是一两

个小时。士兵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范连长来谈话。”由于他能以身作则，处理问题正确，全连的官兵又怕他又敬他，所以不到1年时间，这个调皮捣蛋的连被他整顿为最好的一个连。

调访上海（1913——1929）

1913年第四师调上海，次年他即提升为炮兵第一营长，驻防高昌庙。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地区，凡是驻该地军队没有不受那种腐化堕落思想影响的。唯范营长管理部队十分严格，建立了请假制度、学习制度、储蓄制度，生活管理很有秩序。每天早操，他总是先部队到操场；每天晚上，他必亲自到各连检查一遍是否有夜宿不归和闹事生非的。他管理的这个营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群众都誉之为“柳亚子军”。

他公私分明，一尘不染。过去，当炮兵营长是一个肥差，除正薪1百两银子外，每月还可节余5百两公款，一般即归营长额外收入。而范营长丝毫不苟，凡节余的公款，统统作为整理马具、购买图书、救济贫困、修理营具之用，他分文不沾。他弟弟因在南方水土不服回原籍，给他要钱安家，他说：“我每月只百余两薪金，只够全家开支，那里有节余的钱。”他弟弟说：“一个炮兵营长每月有5百两的收入，谁不知道？”范营长很严肃地对弟弟说：“节余的钱是公家的，岂能归个人所有？”他的几个老朋友梁仁齐、周秀

章等，偷偷地给凑了4千元，背着范营长给他弟弟，让他回原籍安家去了。

范筑先不爱女色，也不像一般军阀娶着三房四妾，把妇女作为玩弄的工具。1919年7月间，他当营长时，同乡张维玺（在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当营长）从湖南到上海治病。由于他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多年不遇，所以招待备至。有一天他的几个老朋友梁仁齐、周秀章、蒋佃杰、李德和我等六七人，撺掇他请客。在远东饭店吃完饭以后，看周信芳的《月下追韩信》。看完戏已经12点了，大家认为这样还不够热闹，有人提意去“叫条子”，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夜。范营长不同意，可大家推推拉拉一起到了旅馆，并起哄说：“主人先叫！”范坚决不干，梁仁齐说：“这一番好意叫你给吹散了。”周秀章拿着一张纸到他跟前一摆，大家逼着他非叫不可，他被迫在大家劝说下叫了一个妓女。这样，大家才分别活动。他在茶房借了一本书，坐在灯下看起来，这位妓女看他那样严肃的态度，很恭敬地向前施了一个礼，问道：“大人，你为什么现在还不睡？”他对妓女说：“我有病，只能看书，不能睡觉，你先去睡吧！”妓女看他睡不着，也不敢去睡，陪着他在旁边坐着，一直到黎明。范营长很和蔼地问那个妓女：“你是哪里人？有父母吗？有兄弟姐妹吗？为什么投入娼门？”妓女把她的身世都向范营长说了，一边说一边哭，痛恨自己的遭遇不好。范营长安慰她说：“你们都是良家闺秀，为

贫穷所迫才卖身以求生存。我也是个穷人出身，很同情你们的痛苦。我给你30元大洋，你可以寄回家去。”妓女不敢收，范营长劝她把钱收下，并把全部住宿费统统一清算清结帐，天未明就离开旅馆回兵营去了，妓女含着感激的眼泪叫了一声：“大人再见！”天明，我们几个早漱毕找范营长，茶房说：“他一夜未睡，已结帐回去了。”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柳下惠”。

1918年他提升为第四师参谋长，该师师长陈乐山为拉拢他，在苏州物色了一个美女，年仅18岁，很漂亮，名叫迎春，派副官用汽车送到范公馆，见了范参谋长说：“我们师长送给你一个美女，请你收下。”范参谋长很惊讶，他考虑不收不仅让师长难看，而且对这个女子也不好（这个女子已经付了身价，退回去不知落到谁手，影响这个女子的终身），不如权且收下。于是对副官说：“请你转达给师长，多谢他的美意！”副官走后，范参谋长问了这个女子的身世，了解到她家贫无法生活，父母都有病，无钱治病，因此卖身给父母治病。范听了很酸心，很同情她，马上从家里拿出1百元对这个少女说：“再给你1百元，你回家侍奉你父母吧！治好你父母的病，还可以拿这些钱去上学。”这个少女感动地流下泪来，马上跪倒在范参谋长跟前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人的恩情，大人救了我，又救了我的全家，来生变犬马来报答您的大恩吧！”范参谋长扶起她来，叫她快走，那个女子说：“老爷！你的名子和

住址我得记下来，以便日后报恩。”范参谋长说：“不用了，我是军人，住址不定，你走吧！”这个女子仍踌躇不敢走，并问：“是否还叫我坐汽车走？”范参谋长领会她的意思，马上让自己的女儿雇了一辆人力车，付了车钱，让她从后门走了。这个女子一边走一边往后看，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这一段是范晔清提供的材料）

他当了旅长之后，不少人撺掇他娶一个姨太太，并对他说：

“陈师长从苏州给你物色了那样好的一个美人你不要，你要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帮忙。”他说：“我这样大年纪了，孩子已经大了，搞这些干什么？拿别人的痛苦供自己享乐，玩弄妓女，我不干。”并很诙谐地说：“把帝国主义都打倒，我娶一个外国姨太太。”

1917年冬，该营奉令调防浙江嘉善。他们开拔的那一天，高昌庙一带的群众、学校、机关、团体，如同过年一样地锣鼓喧天来欢送他们，给范营长送了万民旗、万民伞，以及金鼎银盾等，各商店路口都摆酒桌，爆竹连天，给范营长送行。范营长和欢送群众最后拱手告别，说：“我身为军人，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民，大家对我一番盛意，我受之有愧。”在一片欢呼声中告别了上海。他走了很远，群众还翘首相望，依依不舍。他走后，地方上留下了一个谚语：“炮兵营长，每月5百两，干了3年整，没剩半分两。”到了嘉善不久，即提升为师参谋长。1920年第四师成立了一个补充团，范参谋长兼该团团长。1924年提升为第四师八旅旅长，晋

中将銜，江浙战争开始后，他担任浙沪联军第二路前敌指挥。

江浙战争是1924年7月初全面开始的，范旅长的任务是负责堵击齐燮元部第三路宜兴一线，在宜兴白閭山和齐部接触。白閭山有一个山口很险要，齐部一万多人夺此山头，可范旅长率部捷足先登，并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后来，他派其主力迂迴其后方，使齐部腹背受敌，全线被打垮，后退70余里。在这一带，双方相持约半月之久，浙沪各路都取得了胜利，齐燮元节节后退，眼看就要全线溃败，他急电求援于吴佩孚，吴从7个省调了1个师9个混成旅增援江苏。卢永祥看形势不利乃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又坚持了10余天，于8月初旬已打得弹尽粮绝（卢派人在上海和美商交涉，以20万现金购买弹药，美商逃之夭夭，把钱骗走了），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紧急情况下，在上海龙华寺召开军事会议，征求各师长意见，陈乐山（第四师长）首先不主张打了，他说：“仗好打，就是没有子弹，赤手空拳没法打。”他的主张影响了其他将领，皆默然不言，卢在无可奈何之下乃通电下野，搭火轮跑到东北去了。当时，陈乐山委第七旅长夏兆麟为第四师长，夏不就职，又委范筑先暂代第四师长，范也不干，陈丢了部队逃往大连去了。

这时，孙传芳部下一个师长叫谢洪勋，是孙的前敌总指挥，系山东冠县人，与范是近同乡。他以同乡的关系在嘉善用电话和范旅长通话，他很恳切地劝范旅长说：“咱们是老乡，孙总司令和周荫

人给你带信（孙在前清时担任过第四师随营学堂的教官，四师的军官不少和孙相识，四师官兵大部分都投了孙），请你把队伍整理一下，全部带来吧！你的原职不动，并给你宁波镇守使。”范旅长在电话上很直快地回答说：“我不去了，你的好意我很感激。”婉言拒绝了他。谢误认为封官太小，紧接又来一电报。其大意：××乡兄勋鉴，忝属乡谊悠关，极感欣慕，顷奉孙统帅面谕，请兄迅速收容江浙联军官兵和武器，集中松江附近，给养饷需，由我方备发，授兄为第四师长之职，所有官兵原职不动等语。范接此电报后，亦未表示态度，复电如下：××师长麾下，来电敬悉，此特复。

范旅长的第八旅辖十五、十六和补充团3个团，一个炮兵第一营，除补充团战斗损失较大外，其余皆保持战斗实力，如收拾残局，完全可以集中万余人以做投降的本钱。但他不愿那样做，他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有节气的人，宁可解甲归田，也不做投敌失节之事。他当时考虑（事后他当面和我谈），如继续打，一来兵心厌战，二来众寡不敌，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再者打这种仗对国家民族没有什么意义，只有丧失无数官兵的性命，蹂躏地方，给国家给群众造成损失。于是，他决定也采取陈师长的办法，解甲归田。考虑妥当，他马上召集了营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残局无法收拾，让他们“各投其主，自找出路”。所存的官兵饷项，着军需官王小亭和耿副官负责，一律发给官兵个人，并严令不许克扣兵站的面粉

等食物，都分给有家属的官兵。这些事情办完以后，十六团投编第二师龚师长麾下，其余部队都投编孙传芳，还有一部分溃散跑到上海，有的跑到租界被外国人缴了枪。

刚失败那几天，范旅长接到十几万官兵伤亡抚恤金，他携着十几万的款子回家，他夫人问他：“这是从那里弄来的钱？”他说：“这都是咱们的钱，在家好好地看着，千万不要动。”不几天，范把这十几万全部都发出去了，他并没有乘此混乱局面捞一把。（据范华清讲，她亲见家里窗口内桌子旁有两个过去范的随从，一个念名单，一个数钱票，窗口外有一队人按顺序一个一个地领款，并听到他父亲说：“我这一份款不要了，也分给弟兄们吧！”）钱都发完以后，他夫人问他：“这不是咱们的钱么，为什么都发给了别人呢？”他说：“这都是公款，不能动用分文，我叫你好好保管着，恐怕你从中拿钱。”

范旅长退隐之后，为表示其志坚如松，品清如竹，把名改为筑先（原是竹仙），道号松竹道人。不久，被福建主席李厚吉聘为教导团长，由于李团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倾轧排挤，实难容忍，即辞职不干，仍居上海。

他在上海前后住了3年，每天写字、画画，看古书，学英文、代数、几何，一早一晚带着孩子练太极拳、太极剑以锻炼身体。除

了和梁仁齐、周秀章等老朋友交往外，与外界没有来往。因为没有积蓄，粗食布衣勉强以维持生活，以后逐渐变当东西，把群众送给的金鼎银盾都变卖了，最后到了穷途末路，不得不靠借贷来维持生活。

五卅惨案发生，激起了范将军的爱国热情，他再难以在上海垫居了。1929年秋天，他的同乡张维玺在陕西汉中当镇守使，约他到那里帮助工作。他把全家都送回原籍，自己孤身到汉中去丁。

(以上材料部分是我亲眼所见，部分是范晔清、范树琨口述)

投西北军(1929——1931)

1928年韩复榘倒戈，张维玺率领他的部队退守汉中，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范筑先将军到了汉中，张就聘他为高级参赞。由于他博学多闻，品德高尚，到那里不久即为全军所敬仰，名义上是参赞，实际上是担任参谋长的任务。张维玺和他是同乡又系同学，感情甚笃，他们同心协力将范训练部队的经验和西北军原有的优良传统结合在一起，把这几万健儿训练得象铁军一样。1930年冯玉祥联阎讨蒋，把西北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命令张维玺部挥师中原，截击蒋。张把王志远一个旅留镇汉中，张和范参赞率精兵4万脱颖而出，出太康，下南阳，直扑许昌，切断了京汉线，逼使

蒋 不得不退守漯河。这时冯玉祥委张维玺为讨蒋南路军总司令，范担任参谋长，指挥吉鸿昌、高桂滋、孙殿英等部在扶沟、柘城、漯河、许昌一带和蒋 相持，每次战役都取得胜利，逼着蒋介石不得不亲临前线指挥，在漯河之役险些被俘。由于冯玉祥战略上失败，张学良出关援蒋，影响了整个战局，南路军吉鸿昌部梁冠英首先投蒋，孙殿英、高桂滋等部也投蒋。范和倪看形势不利退到河北清华一带（以后投了蒋），只有张维玺部退守新郑，蒋介石倾全力几十万人把新郑团团包围。蒋派人劝降，当时内部分两派，倪云升主降，赵凤林主战。张和范筑先参谋长商量，仗是不能打了，一来冯玉祥垮了，讨蒋的旗子倒了，再打下去得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能突出去，牺牲一定很大，这些牺牲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二来，如为避免无谓牺牲而受编投降，这种讨蒋而投蒋的失节行为绝对不能做，“誓死不能投蒋”。最后他们俩换了便衣离开了部队，化装到了天津（赵凤林也离开了部队，倪云升收拾残局投了蒋，整编后，蒋看倪没有气节便把他踢开了）。

范筑先将军到了天津，住在张维玺家，每天和在上海一样看书写字，打太极拳，一直住了将近1年。但寄居张家终非长策，1931年10月，经张介绍到了山东，韩复榘委他为省府参议。

（以上是原第六区专署秘书张墨林的材料）